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8.05.011

论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理论学科的定位问题

杨晶¹, 卓立²

(1.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2.西南政法大学 哲学系,重庆 401120)

摘要: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的学科定位一直比较模糊。史学理论由传统史学方法论发展而来,唯物史观则拓展了历史理论部分,但亦因其科学主义和意识形态化,遂使人们不断深入思考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为辩护历史学独立性,国内史学界重建了史学理论学科,历史认识论成为其主要内容,历史主义则是其思想内核。然而随着当代历史认识论由历史主义日益转向历史相对主义,它在去科学化及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亦使历史学“去知识化”。实际上,史学理论作为理论学科,最终要走向历史哲学。但在当前,哲学界并没有历史哲学的学科位置,其原因在于历史相对主义不仅使历史学“去知识化”,它亦令哲学“去知识化”,哲学中只有“历史转向”,但没有“历史学转向”。史学理论由是只能作为史学学科存在,导致其深陷与史学研究的范式冲突。

关键词: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历史主义;历史相对主义

作者简介:杨晶(1986—),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史研究;卓立(1976—),男,福建霞浦人,历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历史现象学、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 2014 年度培育项目(2014py31)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8)05-0064-07 **收稿日期:**2016-11-11

一、引言

2011年教育部学科体系的重新分类,对历史学领域最大的影响莫过于世界史和考古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但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史学理论学科定位却因此变得模糊。因为这一学科即使仍能以“中国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理论”的名义存身,但对于具有“总论”性质的史学理论学科来说,它所包含的元学科探究内在地要求超越这种分裂,因此,“统一”正是它作为学科存在的基本前提。

实际上,新的学科分类还意味着朴素实在论成为历史学的绝对信条,这个信条的基本要义是:历史学的全部研究内容,都是可以按时间和空间明确区分的对象,历史学的知识合法性依托于这种时空区分的绝对实在性,从而在历史学内,唯有具备时空要素的才有研究意义。于是,旨在超出具体对象进行元学科问题研究的史学理论便就其自身被对象化,并一分为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理论在根本上被史学史化,它不再是具备超越性的“理论”本身,而只能是作为史学史的一部分的“史学理论史”。其基本逻辑是,首先有绝对的实在的时空,然后是生存于这时空内的实在的人,最后是这些实在的人的活动与他们的言说,而这些人关于历史学的言说则成为“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意义由此便不在于寻求自身问题的正确答案,而是在于它能否被确定为“某某人说”。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取消了元学科问题的研究意义,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的学科基础也就被动摇了。

与历史学不同,几乎所有其它人文社会学科,都有包含其元学科探讨的总论型学科作为二级学科,如文

学理论、宗教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并且无一不引入相关哲学理论展开交叉学科研究。在哲学中,尽管我们也一样按照时空对象之分,分立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但“哲学”还是一级学科(“历史学”则不再是了),超越具体对象(个别学说)的关于哲学问题本身的探究实际上是“最高级”的。而在历史学中呢?关于元学科的研究原本便是边缘的和附属的,而今则进一步沦为“非法”的了。面对这种学科建制上的困境,史学理论这一新兴学科究竟该何去何从?史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又该如何确立自身呢?

二、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的含义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包含关注史学实践技艺的史学方法论、关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的历史理论和关注历史学学科性质等元学科问题的历史认识论三个部分。而狭义史学理论,主要特指探究历史学元学科问题的历史认识论,这也是本文对其的主要用法。

史学理论首先与史学方法论有关,而史学方法论是反思的,也是自发的,或者说每一历史学研究者,都可能自发思考过如何研究历史学的问题,其中一些作者可能会将这些思考撰写成文。当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更会有研究者就历史学本身进行反思,形成自发的史学理论论著。比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基本上都是历史学家对自身(个人或历史学家的群体)研究活动的反思结果。但是相对于数量浩如烟海的历史学研究,这种反思如果是面向个人研究经验的反思,则往往是彼此重复的少量观点,如果是面向历史学家群体研究的反思,则又是总括性的,数量极为有限。罗荣渠先生说:“总的来说,过去的历史学家是很少搞史学理论的,而专门讲史学理论的,大半不是专业历史学家。”^[1]要而言之,这样一种定位于史学方法论的传统史学理论,在机制上无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法让大量从业者有事可做。

清末民初的史界革命,其要旨之一是历史学的科学化,并以此作为西方精神改造传统史学的切入点,使历史学成为可靠合法的知识。科学化是沿着两个方向推进的,一者是将历史学视为建立事实的经验学科,使历史学“实证”化;另一者则依循数理学科的形式化路线,试图超越个别历史事实,致力于关乎人类历史的理论研究,探究历史规律。要之,一者相当于在历史学中移植近代实验科学之经验主义精神,另一者则以科学之理性主义为本,前者的代表即为史料派,后者则为史观派。两者之间之所以形成深刻的对立,乃是源于在历史学中进行形式化的理论演绎一直无法达到如自然科学中实验事实与理论演绎水乳交融之境,进而使大批历史学者宁可退守“实验”路线。然而,理性主义本身是科学化的内在要求,因而史观派的兴盛本身亦是史界革命之科学化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引入则使之达到顶峰,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能最终一统天下,与彼时对西方科学的崇尚有关。

毋庸置疑,唯物史观(史观派)是一种史学理论,与传统的史学方法论不同的是,它成功开辟了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战场,并同时包含了方法论和史学实践,其规模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其具有了一般哲学的意味,一直指导着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而历史学自身理论与方法的蕴育与发展却被长期遮蔽,这引起了大量史学家的反思。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历史观”的意义,还包含了大量政治主张(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历史学在它的指导下,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结果是,它并非成为“属于史学的理论”,而是使史学成为“属于理论(政治理论)的史学”。史学本身因此陷入生存危机,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有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了。有基于此,1966年前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才会有回归历史主义的呼声^[2]。本当确立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代替了“史学理论”,因为史学若已不存,史学理论又将焉附?

1976年之后,张芝联先生首先提出要区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3],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实际上是将历史主义巧妙地置于阶级斗争的矛头之外,为历史学的学术自治争取了空间。20世纪80年代前期“三论”的一度流行,引发了历史学领域新一轮的科学主义,以致“史学危机”的警钟再度长鸣^[4],新时期的历史学界亟需发展新的史学理论来保卫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国内今天的史学理论学科(主要为历史认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立的,其标志性事件便是《史学理论》杂志(1989年后复刊改名为《史学理论研究》)的创办。有基于此,《史学理论》的创办,首先从论证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应有属于自己的

史学理论开始。其中,《史学理论》创刊号的“代发刊词”写道:“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灵魂。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长期以来,历史学这门理论性十分强的学科,却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史学理论。一般哲学体系取代了具体学科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历史唯物主义是要指导史学研究的,就象它要指导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但是,指导不等于取代。”^[5]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史学理论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近几年我国史学界在理论认识上的一大进步。”^[6]显然,国内史学理论学科的开创,是由历史学界一力而为,而其初衷,则是试图为历史学科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保驾护航。这便导致新的史学理论学科将在传统史学方法论和历史理论之外,以历史认识论的反思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一主题,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思想界也积累了大量关于历史学元学科问题的讨论文本,其中以反科学主义的历史主义及其后学后现代主义最为活跃。因此,以《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为核心阵地,以历史认识论相关问题为中心,通过大量引进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在国内形成了绵亘至今的新的历史主义思潮,并在近几十年间改变了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史学观念。

问题在于,新兴的史学理论学科是基于历史主义展开历史认识论反思,然而引进的西方历史主义思想(尤以柯林伍德和克罗齐为代表)虽然被国内历史学者广为接受,但却在实现去意识形态化和去科学主义化的同时,也付出了使历史学去知识化的代价,并在历史主义反转为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历史相对主义后,动摇了历史学本身的知识论根基。这也就决定了这种史学理论研究根本上是与实际的历史学研究活动是脱节甚至对立的,因而它也就难以与传统的史学方法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学术自治的历史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历史理论研究的敌意,这也就意味着以历史主义为内核的史学理论学科,在根本观念上已经悬置了历史理论的研究,那么能留给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便基本只剩下了范围狭窄的历史认识论问题及其相关文本,它们在数量上相对于一门学科显得过于单薄了。显然,这种以历史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具有极大局限性,这是建设史学理论学科不可回避的问题。

史学理论这种随着历史认识论的推进导致的相对主义化,引发大量历史学界学者不满,这种不满与历史学界对哲学范式的传统敌意结合起来,形成了对历史认识论的排斥。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2012年召开的编委会上,不仅有学者指出当前历史认识论的非知识化倾向导致了“碎化、伪化史学的负面作用”(虞和平),更重要的是以历史认识论为中心的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方向遭到质疑,并由此建议《史学理论研究》杂志改变办刊方向。其中,王和说:“近30多年来,学者们对于史学理论的兴趣多集中于史学认识论,主要关注历史认识论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在后现代史学之后,史学认识论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大——包括西方所谓‘认识论历史哲学’之后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说到底,探讨的仍然是历史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而这一研究在本质上已少有新意;但史学本体论方面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按照新的表述方法,‘史学理论’已难有突破;‘历史理论’则大有可为。因此,建议《史学理论研究》今后更多地关注对于历史本身的理论阐释,争取发表一些有创见和新意的文章。”^[7]问题在于,悬置或封杀历史认识论研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历史认识论导致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潮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并且其根源在于由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导致的哲学的相对主义化。自然科学的这种革命性发展,标志性的事件便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取代了牛顿的物理学并引发了量子力学,实在论的理论基础由此瓦解,整个自然科学理论由此已经被公认为转向了建构论,因而历史认识论由建构论出发而导致历史相对主义也就是时代趋势。实际上,历史实在论本是前反思的常识观念,它既阻碍不了历史相对主义的产生,更不可能中止历史相对主义思辨,正如前现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可能用来反驳牛顿物理学和量子力学(在常识视野下量子力学一样很荒谬)。历史认识论并非不能有所突破,因为当前历史认识论导致的历史学去知识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一问题最终要解决,只能依赖于进一步推进历史认识论研究。然而虞和平与王和的发言亦如实体现了当前史学理论学科的生存危机,即一方面大量历史学者对继续纠缠范围狭窄且论证玄奥的历史认识论问题深感厌倦,另一方面阉割了历史理论的史学理论以历史学二级学科存身的合法性亦遭到更多质疑。正如新学科分类所体现出来的被绝对化的“对象原则”,在历史学内从事研究,只有“问题”没有“对象”基本意味着没有必要存在。

实际上,学科分类改制前的史学理论学科,也一直是和史学史学科共享一个二级学科的“编制”,从而缓

解了自己在研究对象数量上的不足,但这种共享在深层次上又体现了史学研究范式对史学理论的理论研究范式的束缚。因为史学理论在根本上是一个理论学科,而理论研究最终要求不断深化对问题的思考,并由此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形式话语系统。这就意味着史学理论内在地寻求向哲学研究上溯,它内在地要求自己同时也是历史哲学,一个哲学的二级学科。而在哲学的问题研究视角,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研究对象不足的问题便不是问题了,因为哲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亦面临“没有对象”的困扰,或者说整个哲学都在围绕少量根本问题反复诠释,但这并不会危及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然而,问题在于,史学理论有无可能以历史哲学的名义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

三、历史哲学的合法性难题

“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即使仅据字面也能看出,前者乃史学学科,而后者为哲学学科,至少也是历史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

就语词本身而言,“历史哲学”一词的涵义范围是变化的,在19世纪的语境中,“历史哲学”一词主要指那种将唯理主义推广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也即今人所谓之“思辨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出版后,“历史哲学”这个词似乎就成了哲学侵略历史学未遂的失败榜样,以至布克哈特甚至说,历史是第一级的学科,哲学是次一级的,而“历史哲学”这样的说法在语辞上是矛盾的^[8]。自20世纪以来,历史哲学的探讨开始转向历史认识论问题,以致有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新旧历史哲学”之分。史学理论学科若主要致力于历史认识论问题,那么正如历史认识论这个哲学术语所寓示的,它根本上仍是一种哲学。历史认识论的哲学“血缘”导致相关讨论不断援引各类哲学论述,哲学界的学者亦间或参与其中,因而部分哲学系出身的学者会倾向称之为历史哲学。把这一学科称为“史学理论”而不是“历史哲学”,是因为它主要在历史学科内开展,另一个理由则源自历史主义者对哲学的敌意。因为历史主义者以维护历史学的学术自治为本旨,首先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认为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反思,必须以历史学家的治学经验为基础。安科斯密特因而以“历史哲学”所含的“哲学”一词内置了某种“神学”雄心为由排斥“历史哲学”一词^[9]。历史学者所区分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也就被认为是对应于哲学学者所区分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10],实则是利用所谓“历史”概念的二分(分为历史本身与历史学两层),回避了“哲学”一词。也就是说,尽管“历史哲学”一词并不受史学家欢迎,但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根本上仍是一种在历史学科内开展研究的哲学。

然而,历史哲学作为哲学学科在哲学界一直是边缘化的,事实上,在哲学学科中语言哲学、科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这些学科都地位显要,甚至文化哲学、艺术哲学(美学)等也有一席之地,但谈不上有历史哲学的位置。哲学系出身的周建漳先生有一段话颇为细致地描述了历史哲学作为哲学学科的边缘地位:“综观历史哲学的学术现状,应该承认,即便在本来就不可能成为流行时髦的哲学领域中它也属于较为冷僻的学科……在著名的《哲学杂志》中,每年来稿中估计只有千分之一的稿子多少涉及历史哲学的问题。在一般分析哲学家眼中,历史哲学之于哲学,正如军乐之于古典音乐,是那些缺少哲学才能的业余爱好者从事的工作……正如《历史与理论》的一位资深编辑所说,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历史哲学在世界各地几乎成为‘学术孤儿’……人们对‘历史哲学’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它常常被听成‘哲学史’。”^[11]换言之,对一门学科的元学科研究,固然由于其必然上溯哲学研究而可以称为“某某哲学”,但不等于它可能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对于历史哲学来说,它在哲学界的地位,基本等同于建筑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之类,其对于哲学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究其根本在于,要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必须对哲学根本问题的解答有所助益,对哲学有所“付出”,而一门单纯的元学科研究,只是借鉴哲学研究成果,它只是“拿来”,没有“付出”。因此,假如历史哲学将自身仅限于“历史学元学科问题研究”,却既无法对实际历史研究有所助益(如支援历史理论研究),又无法对哲学根本问题有所贡献的话,它终将只能局限于“哲学化的史学方法论”这一隅之地。

那么,历史哲学还有成为哲学重要分支的可能吗?对历史哲学的反思,还有无可能如语言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那样为反思哲学根本问题提供重要支点?值得注意的是,韩震曾经提出哲学中也有过历史学转向^[12],相似的说法亦可见于张鹏翔的《历史思维对科学思维的解蔽》^[13]。其实,现代哲学中的确存在历史转

向,但把此种历史转向称为历史学转向并不合适。因为历史转向与历史学转向不同,前者意味着哲学开始关注历史性,后者则是指哲学开始借鉴历史学,就此而言,哲学中并未出现历史学转向。哲学中的历史转向意味着尽管哲学仍然不断试图追溯先验性,然而当普遍理性与形而上学作古后,概念化的基础与本原不再以本质的名义占据哲学的中心,思想与观念的历史性与生成性则同时在多条路线上展现,并且这一进程也的确经由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的路线继承了历史学派的本旨。实际上,尽管近一百年来,历史性在哲学中已经压倒先验性,普遍者开始被视为只是一种学说,关于它们的演绎首先是一种学说史或观念史。历史主义以语境主义的形式已经深刻影响了当代哲学,并且也出现了如“科学历史学派”、“知识考古学”(福柯)、“历史现象学”这类颇具历史学意味的哲学流派或主张,但却不意味着这种历史转向可以称为历史学转向。关键在于,历史转向对于哲学而言意味着一股“反知识论”的力量,而“历史学”恰恰也意指一种知识形式,即它本身是知识论范式下的哲学产物,就此而言,反知识论化的历史转向永远不等于知识论化的历史学转向。因此,哲学的历史转向无法转化为历史学转向,恰恰相反,它是走在瓦解哲学同时亦瓦解历史学本身的路上。另一方面,哲学根本上源于人们试图经由反思在现象中寻求本质、在幻象中寻求真实、在分裂中寻求统一、在流变中寻求普遍、在迷乱中寻求明晰与确定的冲动,即使是后现代主义者得出的绝对历史性的结论,本身亦被视为一条终极的铁律,否则也没有说出的意义。就哲学而言,倘若要发生历史学转向便意味着哲学需要在历史学中重新发现这种最终指向“真”或“真理”的根本诉求。所以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虽然引入历史学派立场,但他根本上仍在寻求超越的确定性,海德格尔虽然以历史性的实存逆转了与存在者的关系,但却是基于“存在之真理”对认知真理的反转。语言转向因而取代了可能的历史学转向,因为当“实在”问题转化为“说出的语言”或“学说”问题后,哲学的“求真”仍可寓居于对公共层面的“语言”的反思,也即所谓的“语义上行”,但若回到历时态或历史化的“学说”的历史考察,即回到材料准备阶段的学术史考察,则相当于取消哲学反思(如罗蒂等人的主张),也就谈不上哲学的历史学转向了。

实际上,在哲学中,即使所谓历史转向,除了强调科学思想史的科学历史学派之外(因为原本科学并不像哲学重视哲学史那样重视科学思想史),也是基本不提的,取而代之的是存在论转向、语言转向或生成、生命、时间等问题,从而将历史性的问题视为实存的一部分置入哲学反思。也就是说,即使是有“历史转向”,哲学真正关注的是“历史性的存在”,而不是“存在的历史”。在哲学中发生“历史学转向”只有一个可能,即历史性不再指向对“真”与知识的消解,从而使我们可以“在存在的历史”中重新找到“知识之真”而不是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真理”,并彻底祛除绝对化历史性引致的历史相对主义。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要求历史理论重新获得哲学依据,因为倘若在历史学中我们能够获得兼容于哲学的知识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势必超越于个体的生灭,那便只有关于历史学中的概念对象的研究能够胜任了。就此而言,可以说,尽管在哲学中已经有了“历史转向”(或者说重新发现了历史性的意义),但如果要进一步指向使历史哲学成为一门二级学科的历史学转向,则必须以祛除历史相对主义为前提,这一点与上节提及的解决史学理论的去知识化的问题是一致的,其最终结果是得以打通史学理论/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历史研究之间的桥梁,使前者不再指向对知识与理论的消解,后者不再是悬置哲学反思的无源之水,但也不能再指向令历史学家厌恶的“空洞的概念游戏”。显然,这一工作至今尚看不见曙光,当前我们的史学理论还无法通往历史哲学,也未能通往历史理论。

四、史学理论的学科范式与定位问题

史学理论是一个理论学科,这是它与其它历史学分支学科根本上的区别,并决定了其必须服从理论研究范式而非史学研究范式,但隶属史学学科的现实又导致了理论研究范式与史学研究范式的严峻冲突。

与其它学科不同,文艺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研究等领域并不排斥哲学思想,而是努力引入哲学思辨来开拓自己的理论研究领域,历史学则相反,它的学科建设深受历史主义思想影响,而历史主义则对概念研究与理论研究深怀戒惧。这一方面导致历史学围绕其以材料为中心的理念建立了自己的学科范式,具体的个别的时空对象成为研究的根本,一切理论与概念问题则被视为可以编辑成史的学说,基于此,材料的实、多、广、新成为判断研究优劣的标准;另一方面,那些包含共时性研究并因而致力当下研究的内容,比如社会、政治、文化等,都渐渐获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仿佛能留给历史学本身的,便是永远不可概念化的那部分内容。

也就是说,定位于元学科研究的史学理论成了历史学内仅存的以理论为本的异类,而其受众却是全部的历史学工作者,历史学以材料为本的研究范式便从多个角度制约了它的发展。

首先,史学理论(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有别于其它历史学科分支,它们不是具体的人或事,而是有限几个似乎人人皆可“漫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如非上溯到系统的哲学反思,仅停留在常识语境中是不可能展开并说清楚的,这使主要基于日常语境思维的历史学者常常认为这些问题空洞而没有研究价值,而相关研究若越深入理论细节则越被历史学家拒斥。也就是说,史学理论如果像哲学那样以问题为研究对象,便很难在历史学内立足,最好的出路,是尽量把问题研究转换为学说史研究和文本研究,如此便可依托于时空化的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把史学理论研究转变为史学思想史研究。

其次,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也与其它史学学科不同。作为理论学科,其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标志是要形成属于本学科的一套形式话语,以应用于对应问题的理论分析,因此史学理论势必借助于概念不断拓展自己的解释系统,以便其研究更加专业化和学理化,结果也必将导致没有接受过这一学科专业训练的其它历史学者越来越难以仅靠自己的治史经验参与其学术讨论。这是一门理论学科专业化的必然结果,比如在科技哲学走向专业化后,未经相关专业训练的科学技术专业人士便越来越难以读懂相关文献。然而由于史学理论是一门史学学科,多数历史学者是将其定位于传统史学方法论来要求它,史学理论让人越来越读不懂的专业化建设必将导致历史学者的不满。历史学者大多秉持朴素实在论立场,从日常语言出发研究写作,这使成功的历史学论文总会是线索清晰且易懂的。而史学理论反思一旦诉诸专业化,必然上溯至哲学反思,哲学反思则大多超越了实在论,它首先要反思中重新建立对世界的理解,再通过一套术语重建自己的问题视域与对象,不了解相关哲学学理的历史学者便难以如阅读其它史学文献那样简便地通过语词快速领会其语义与逻辑。历史学者常常以历史学文献的明白易懂来要求史学理论的写作,结果如同以科普文章的标准要求物理学专业论著撰写一般,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便会是负面的。

最后,史学理论的学术评判标准与其它历史学研究不同,最明显的表现是其它历史学研究关注的中心是材料,而理论研究关注的是问题本身。在朴素实在论的前提下,材料之间虽有优劣之别,却都是合法的存在,并且当历史过滤去了现实化的话语权力,材料之间变得愈发平等,材料的数量被提升为学术评判的主要准则,论著注释的多寡甚至成为快速判断研究者水准的简便途径。对于理论研究而言,材料则退居台阶地位,中心则是说理的通透与严密。即使是文本研究,假如逻辑不通、解读失误、张冠李戴、概念混淆、前后矛盾,那么即使全文注释如麻,也是一纸废文。并且,对于理论研究,运用概念进行分析的基本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研究者高下,而某一学说中的概念总是相对于特定思想体系,因而并不是所有不同作者的相关说法都合适引用,更不可以轻易撷取只言片语作为论证材料。也就是说,对于理论研究而言,材料(学说)之间在本质上并不平等,很多相关相似表达并不合适成为同一论题的材料,对于特定理论论题而言,最困难的工作是厘清内在于论题的话语结构和边界,各路外部材料则只是点缀和引子的作用。因而理论研究者的阅读目标,并非把阅读内容变成自己的注释材料,而只是用来清理自己对问题的反思。一个理论研究者有可能耗费整年心血阅读,但多数阅读内容不会出现在自己论著中,因为对其而言,避免逻辑错误和学理错误,要比单纯援引一堆材料更艰巨更重要。所以当代著名分析哲学家塞尔说:“我相信哲学质量与参考文献的数目成反比,没有哲学巨著会包含很多注脚(不考虑它的其他缺陷,赖尔的《心灵的概念》就是这类的模型:它没有注脚)。”^[14]实际上,对于更具知识累积性的学科,引用过多文献反而是不专业的表现,例如《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杂志便要求论文参考文献不要超过15篇^[15],因为此类学科的研究材料在不断更替,堆积说法的数量没有意义,只有最新的和受到公认的研究成果才值得引用。对于理论学科而言,论证的目标不是为了堆积材料营造热闹气氛,而是基于对最终能够说出正确结论的基本信念,就此而言,决定论证正确与否的关键不在于引用前说的多寡,而在于其内在逻辑是否通透,这种通透决非如其它历史研究那般拥有足够可信材料再加以梳理便能达到。一个完全通贯的理论论述,最终牵连到整个哲学系统的通贯,这甚至仍是哲学至今未达到的目标,自然也成为理论工作者殚精竭虑的中心。但在历史学科内从事理论研究,若不将相关思考以层层学术史注释的方式展开并尽可能扩大篇幅,则将难以获得认可。

综上所述,由于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评价标准方面与其它历史学学科存在根本差异,史学理论学科实际上亟需确立自己的学科范式。但由于历史哲学没能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也就无法借助其论证自己的理论范式。当它独自栖身历史学科内时,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便左右了它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与其内在的理论学科范式形成根本性的冲突。

五、结论

可见,在史学理论的理论研究范式与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其结果,不是其理论性压制了历史学研究范式导致历史学危机(如“文革”期间),便是历史学研究范式压制了其哲学化方向和专业化方向,进而使其边缘化甚至“非法化”(尤其是历史认识论部分)。然而,鉴于史学理论目前只能是一门史学分支学科,尽量服从历史学研究范式便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新的教育部学科分类只不过加剧了史学理论面临的范式冲突与生存危机,真正的出路在于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必须在根本上克服历史相对主义,并打通与历史理论的桥梁,洗脱旧式历史哲学的恶名,然后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也就是说,史学理论的未来最终取决于走向新的历史哲学,而在“史学理论”成为真正的“历史哲学”之前,它必须在这种范式冲突中生存和发展。首先,史学理论应该进一步将目标转向文本,而不是面向问题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与史学研究范式充分融合,并在文本研究中不断扩充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次,在史学理论划分为“中国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理论”后,史学理论的研究者应该重视世界史学理论的建设,因为目前的史学理论研究文本以西方为主,且只有在世界史学理论的学科框架内,才可能与外国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最大程度地扩展史学理论的研究文本。可以说,如果世界史学理论能够充分与哲学文本融合,即使还不能打通与历史理论的桥梁,其内容亦已足以支撑一门二级学科的规模;最后,尽管史学理论学科要尊重历史学的研究范式,重视材料和文本,但不能丢掉理论学科的特点,这是它的立身和发展之本,只有努力完善自己的学科形式话语,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同时开拓与哲学研究的交叉研究,才可能使史学理论真正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

参考文献:

- [1]罗荣渠.史学改革与史学理论[J].史学理论,1987(1).
- [2]孙卫国.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1).
- [3]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J].世界历史,1979(1).
- [4]王学典,陈峰.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J].东岳论丛,2002(2).
- [5]时代·历史·理论——代发刊词[J].史学理论,1987(1).
- [6]蒋大椿.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建设和发展史学理论[J].史学理论,1987(1).
- [7]虞和平,彭卫,马宝珠,等.进一步推进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编委会发言辑要[J].史学理论研究,2012(2).
- [8]丹图.叙述与认识[M].周建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9.
- [9]Ewa.Doman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8:69.
- [10]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11.
- [11]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96.
- [12]韩震,孟鸣歧.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4.
- [13]张鹏翔.历史思维对科学思维的解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14]塞尔.心灵的再发现[M].王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 [15]《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征稿简则,http://www.rcpstsxu.com.cn/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132

[责任编辑 王记录]